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

绥服远人

——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

徐 毅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013029492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G529

4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

绥服远人

——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

徐 毅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G529
4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绥服远人：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徐毅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
ISBN 978-7-5097-4088-0

I. ①绥… II. ①徐… III. ①教育史-研究-广西-清代
IV. ①G5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4145 号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 绥服远人

——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

著 者 / 徐 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王琛场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王玉霞

责任校对 / 吕伟忠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088-0

定 价 / 89.00 元

印 张 / 20.25

字 数 / 308 千字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
研究项目·研究系列”
编 委 会

主 任 马大正

副 主 任 晋保平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方 铁	方素梅	吕余生
刘晖春	刘楠来	孙宏开	李世愉
李国强	李斌城	杨 群	宋月华
张振鹏	周建新	贺圣达	晋保平

总 序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以下简称“西南边疆项目”）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管理。“西南边疆项目”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其中基础研究类课题成果结集出版，定名为“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以下简称“西南边疆研究系列”）。

西南边疆研究课题涵盖面很广，其中包括西南区域地方史与民族史等内容，也包括西南边疆地区与内地、与境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中国边疆学等研究领域，以及当代西南边疆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上述方向的研究课题在“西南边疆项目”进程中正在陆续完成。

“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的宗旨是及时向学术界推介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必须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通史类专著，或者是学术综述、评议，尤其强调作品的原创性、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质量第一”是我们遵循的原则。需要说明的是，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必然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在不给学术研究人为地设置禁区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强调“文责自负”：“西南边疆研究系列”所有作品仅代表著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反对都应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切不可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的学术论点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度的评价或过分的责难。只有各界人士把学者论点作为一家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研究这个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惟其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公正和客观，也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不断繁荣。

自 2008 年正式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西南边疆项目”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西南边疆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江蓝生同志对项目的有序开展一直给予悉心指导。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云南省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及云南、广西两省区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在此一并深表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编辑人员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一贯为学人称道，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表达由衷的谢意。

“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编委会

2012 年 10 月

序

作为“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中的一个课题，徐毅先生的《绥服远人——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已如期完成，并顺利通过结项。在即将付梓之际，作者嘱我作序，作为曾经是作者博士后的“合作导师”，我是无法推辞的。

应该说，徐毅先生的这个选题是很有创意的。早在申报这一课题时，他就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当时是非常支持的。其后专家委员会顺利通过，也充分表明了对这一选题的肯定。我一直以为，清代在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过程中，其推行的文教政策及其效果是非常突出的，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清代在西南边疆地区推行的文教政策，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表现在如同内地一样地普及教育，广设学校，兴义学、办书院，全面推行科举取士，更为突出的是，在推行文教政策的过程中，对广西、云南、贵州这三个所谓的文化“小省”采取了政策倾斜，如学额、乡试中额的确定，取中进士人数的规定，庶吉士人选的分配，都给予了特殊的照顾。清政府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对京师首善之地，“培养宜优”；对广西等三个小省要求“鼓舞宜亟”；而对其他大中省则是“利益宜均”。毫无疑问，“鼓舞宜亟”成为了清前期对广西等省推行文教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其目的当然是要获取当地人民的“倾心向化”。这一指导思想取得了成效，对广西而言，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这在本书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在关注广西的科举问题时，有两个现象曾引起了我的兴趣：一是清政府规定，土司不许参加乡试，但在贵州和广西都有土司自愿放弃土司职位而申请参加科举考试，而且都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这是耐



人寻味的；二是在广西这样一个文化小省，它的临桂县居然在有清一代出了四个状元，着实令人赞叹。这是除了苏州府的长州、吴县、常熟三县之外，全国其他任何州县都没有超过临桂县的（浙江的仁和县也仅与临桂比肩，同为四个状元）。这也是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清代在广西推行文教政策的重要原因。

以往对广西教育、科举的研究已有了不少成果，与这些成果相比，徐毅先生的研究更有创新之处。他是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治理入手，着重分析清政府文教政策的利弊得失，特别是注重对深层次的思想挖掘。他不是对制度做简单的静态描述，而是把文教政策放在清政府实施教化的全过程去进行动态考察，描述了有清一代在广西推行文教政策的发展轨迹。从写作特点看，作者抓住了几个重要时期的几个典型事例，并以此为线索展开分析论述，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并在许多问题上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与思考，这也是本书的成功之处。可以说，徐毅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另外，出于行文的考虑，作者并未把清代广西的教育、科举的基本情况一一在各章中列出，而是以附表的方式集中列在了书后。其附表共有十三个之多，这也是作者对清代广西文教事业基本状况的一个梳理，也是很有价值的，读者不仅可以集中了解相关方面的情况，更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作为“西南边疆项目”的一个课题，时间紧，任务重，徐毅先生能够在规定的两年之中完成，还是相当不易的。据我所知，他不仅查阅了大量史料，还多次深入到广西各县去做调研，收集地方资料。如本书所引用的恭城县《重建文庙碑记》，就是他到当地学宫旧址抄录的，他的这种治学态度还是值得提倡的。

本书是“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将出版的第一批专著之一，为此，我还是要感谢徐毅先生为这一项目做出的贡献，并且希望他能够把这个课题继续深入下去，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是为序。

李世愉

2012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导论 “普世主义的教化工程”与“广西”： 对清帝国前期治理策略的思考	(1)
---	-------

上编 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的建成

第一章 “文德绥怀”：明清易代与治桂策略的转变	(27)
引 子 杨芳眼中的广西	(27)
第一节 “边缘”与“之间”：明代广西的复杂含义	(31)
第二节 明人治桂的困局	(37)
第三节 “首明教化”：清人的治桂策略	(48)
第二章 “教养之责”：帝国教化工程重建于广西	(56)
引 子 陆祚藩的抱怨	(56)
第一节 重开乡试与重建官学	(61)
第二节 清王朝的经费改革与养士合法性的确立	(73)
第三节 塑造臣民：明靖江王室后裔朱若炳的个案研究	(86)
第三章 “永绥兆姓”：清帝国的“文教普世 主义”与广西	(96)
引 子 雍正帝心目中的广西	(96)
第一节 从明代的“小省”到清初的“边省”	(101)



第二节 恩威并施：雍正帝的激进改革	(120)
-------------------------	-------

第四章 “蒸蒸向化”：广西人对清帝国教化

工程的认同	(142)
引 子 御赐“土才子”农庚尧的仕进之路	(142)
第一节 清帝如何处置“无人应试之区”	(149)
第二节 助学校之不及	(157)

下编 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的颓败

第五章 从“边省”到“内地”：乾隆帝的政策转向

引 子 乾隆帝如何应对来自广西的鞫愷奏折	(173)
第一节 乾隆帝的“科场整饬”之一：“反冒籍”	(181)
第二节 乾隆帝的“科场整饬”之二：“反舞弊”	(189)
第三节 乾隆帝的“科场整饬”之三：“反勒派”	(201)

第六章 帝国教化工程的颓败与广西社会的动荡

引 子 钱楷的哀叹	(212)
第一节 文教普及运动的中挫	(216)
第二节 “文教空白区”的社会动荡及清帝国的治理失误	(219)
第三节 从“教化”到“敛财”：咸丰帝的彻底放弃	(225)

附 表

附表一 明代乡试解额人数一览表	(231)
附表二 清代乡试解额人数一览表	(232)
附表三 清朝广西各府、州、县学设立时间一览表	(232)
附表四 清代广西进士名录与籍贯一览表	(235)
附表五 清代各个时段广西各地的学额一览表	(251)
附表六 清代前期广西官学学田及其学租一览表	(255)
附表七 清代前期广西各府、州、县廩粮一览表	(259)



附表八	清代前期广西各府贫生银两一览表	(261)
附表九	清代广西庶吉士一览表	(261)
附表十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以前 (包括乾隆二十五年) 义学、社学统计表	(267)
附表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以后义学、社学统计表 ...	(273)
附表十二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以前 (包括乾隆二十五年) 广西书院统计表	(278)
附表十三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以后广西书院统计表	(290)
参考文献		(296)
后 记		(309)

| 导 | | 论 |

“普世主义的教化工程”与“广西”： 对清帝国前期治理策略的思考

本书的目的是探究清帝国前期满人是如何对于一个具体的区域施展其特定的治理策略。其特定的治理策略指的是建构一个超越传统的“汉化”治理模式，具有普世意义的教化工程；其具体实施的区域是指处于“中国”与“蛮夷”之间、“内地”与“边省”之间的过渡地带——广西。在展开全面探讨之前，有必要对本书所围绕之核心概念与研究架构做一阐述。

— 是“汉化”还是“教化” —

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教化”，即是一部需要进行复杂化理解的典范。以传统史观视之，一朝一代对于边鄙地区的教化，乃可以归入所谓“汉化”模式的一部分。言及“汉化”，不免使人遥想十余年前何炳棣与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之间关于所谓“汉化”问题的那场著名的辩论。自诩“汉化”模式捍卫者的何炳棣，四十余年前即以《中国历史中清代之重要性》^①为题，认为满洲皇帝一如汉人帝王推崇中国文化，祭孔朝圣，钦刊经书，更推广儒家教化之术，虽为异族入主中夏之

^① Ho Ping-t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 2: (1967), pp. 192 - 193.



政权，然其制度上汉化之质，不让汉人政权。更因其汉化至深，几与汉人相侔，故其部族政权得以迈向汉式中央集权帝国，且赢得汉人菁英支持，从而以一个异族君主身份而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可谓成功。而近二十年后，罗友枝则以《再思清代：中国历史中清代之重要性》^① 作为何炳棣旧文的一个时过境迁的回应。罗氏之文章，既为再思（Re-envisioning），且副标题系何炳棣二十年前旧文之翻版，旧事重提，罗氏别有新解。特别对何炳棣所捍卫之汉化模式，更是另有新论。罗氏旗帜鲜明地提出：所谓“汉化”模式乃系 20 世纪国族兴起以降，在国族主义之指引下的历史编纂者对历史所进行的近于一相情愿的诠释。在汉化模式之下，所有进入汉人地区的非汉族裔，均为汉人文化同化而同于汉人。罗氏以为这种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模式，抹杀了中国历史上诸多民族的各具特色的面貌和作用，故应当从历史编纂中让位，而代之以更为多元的书写模式。以取代汉人政权明帝国的清帝国为例，清朝君主虽入主明都，而为君临中国之天子，然其作为非汉君主，又遵循其异族祖先之习俗，且在被深厚浓重的汉文化包围的同时，竭力保持自己本民族的特色，更将此一特色投影于包含了众多民族的广袤帝国的实践统治之中。从而形成了清帝国这一异质政权特有的多元治理模式，与先前的汉族政权的治理模式大相径庭。

面对罗友枝如此“肢解”汉化，自然引起何炳棣的反驳，何氏以《捍卫汉化：驳罗友枝“再思清代”》^② 为题，属长文以为罗文之辩驳。何氏在这篇长文末一面提醒罗友枝要记住“Sinicization”一词对应中文解释“汉化”诚然良是，然非绝对精准，更为精准之解释当为“华化”，即是所谓“中国化”，并且教训罗友枝当开始探讨汉化在中国历史上的进化作用。何氏更给出汉化三大要点，不妨撮其大义如下：

一、中国文明之广博杂糅，使异族征服者汉化成为不可避免之

① 全文见 Evelyn S. Rawski,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4: (1996), pp. 829 - 850.

② 全文见 Ho Ping-ti,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 1: (1998), pp. 123 - 155.

方式。

二、汉化固有之力，源于汉人本信仰，推己及人。汉人宽阔无私的心胸、虚怀包容之心态以及丰厚的物质利益所在，使异族之汉化通常为自发而非强迫的。（这一点，可以对应史籍中常用的一句话“倾心向化”。）

三、汉化乃一绵延持续且不断扩展之过程，中国文化之传统，亦能应时趋势，其它文明亦被中国吸纳，以调试中国变化之需要，从而亦被汉化，故汉化有其长期存在之意义。

何炳棣—罗友枝令人瞩目的论辩虽已事隔数载，然其各自提出的诸种对撞激烈的观点，与今视之，业已化为旧日传统清史研究与方兴正隆的“新清史”研究之间争论的焦点所在。如何文所述，教化乃是传统清史研究中异族政权所推行主要汉化策略之一，故上述争论亦投影至本书所探讨的主题之一——“教化”问题之上。在传统清史研究稳坐泰山之日，教化即为汉化的表现形式，几为定论，毋庸置疑。然于诸说竞起，各执其理的今天，以一种复杂而多元的视角来进行审视，则清帝国之“教化”是否仍为汉化的表现形式，则大可商榷。

治史之要，贵在贴近历史以理解之目光审视分析之。故而若是深入体悟清代异族统治阶层之心理，即会很容易发现，若以“汉化”来简单定义清帝国推行的教化策略，于时人而言，不特感觉讶异，更是一种犯忌之举。就清代君主而言，自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夏以降，就对自己非汉族身份倍加敏感——对长期在汉人传统政权统治下的民众，特别是文士（知识菁英）眼中，像满人这样的夷狄之类，不可与汉人相提并论，甚至不应当以人道待之，“先王以禽兽畜之，不与中国之人齿。苟举而加诸中国之民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①。既然“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故建立了清王朝的满人不过是借中国内乱之机攘夺了政权的篡位者。因此，对居住中夏的汉人而言，政权“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

^①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后正统论”。



夷类间之”^①。

面对如此喧嚷嚷嚷的反满舆情，清代君主的应对之策固然是在汉人面前将自己扮演成更为亲切的汉人统治者，以汉人习惯的方式对其进行统治，这一点固然不虚。^②但这绝非清代君主的全部面容，翻检史籍，我们也看到，作为满人入主中国的清代君主，对汉化是何等的大加申饬甚至是避之唯恐不及。1740年5月，即位甫五年的乾隆皇帝就对宗室奏折中满洲姓名两字分写这一仿习汉人风习的细事大加训饬，下旨宗人府详查。这些看似微末的细节，足可彰显清代君主对“汉化”的这种敏感心理，并竭力地保持满人特有的身份认同。^③如此这般看来，清代君主至少就有了面对满、汉的两种不同的面容。但这仍远远不是全部，我们从雍正皇帝的一系列具有强烈政治隐喻味道的行乐图中，可以窥得这位时而做蒙古王公之形，时而做西藏喇嘛之态的君主，拥有着多重针对不同族

① 王夫之：《黄书》“原极第一”。关于清初的排满主义之概述，见 Frank Diko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5–30。更详细的研究，见 Mi Chu Wiens, “Anti-Manchu Thought During the Early Ch’ing”, *Papers on China*, 22A (1969), pp. 5–12。

② 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清代君主在汉族臣民面前从未声称自己是汉人君主，而是反复声言满汉一体，同为皇帝之赤子，故而待之无所区别。如1649年，即位六年的顺治皇帝在当年殿试的制策（由于其时顺治尚未亲政，故这次殿试制策可能出自摄政王多尔袞的授意）即以满汉一体为题，以为策士：“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朕自入中原以来，满汉曾无异视。而远迹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音语未通，意见偶殊，畛域或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见《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庚子。）1655年，顺治又在另一道谕旨中宣称“朕承皇天眷命、统一寰区。满汉人民、皆朕赤子。”《清世祖实录》卷90，顺治十二年三月壬辰。

③ 乾隆谕旨全文如下：“近日满洲姓名，两字分写者甚多。此摺内‘文新’之名，理宜连写，而乃分写，竟似汉人之名。再，宗室王瑞之名，实不能连写，又明明一汉人之名矣。宗室如此命名，甚属不合。嗣后着该衙门详查。应训饬者训饬，应改正者改正。将此晓谕八旗知之。”见《清高宗实录》卷115，乾隆五年四月丁酉。另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例子发生在两年以后，这条谕旨严饬了那些流于汉俗而忘却满洲本务的宗室子弟，并引用了清朝初建政时顺治皇帝的谕旨，以说明保持满人独立特性乃有清一以贯之之道：“我朝崇尚本务，原以弓马清文为重，而宗室谊属天潢，尤为切近。向来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精熟骑射，诚恐学习汉文，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是以顺治十一年六月内，钦奉世祖章皇帝谕宗人府：‘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前准宗人府、礼部所请，设立宗学，令宗室子弟读书其内，因派员教习清书，其愿习汉书者，各听其便。今思既习清书，即可将翻译各样汉书观玩，著永免其习汉字诸书，专习清书。尔衙门传示，所以敦本实而黜浮华也。’”见《清高宗实录》卷181，乾隆七年十二月丙午。



群的不同面容^①。面对帝国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臣民，清代君主所表现出的乃是不同的统治者形象。帝国对这些不同区域的不同臣民，亦各因其宜，实行不同的统治政策。故而清帝国治世理念，与往昔汉族政权迥乎不同。对往昔的汉族政权而言，或名正言顺的“用夏变夷”，在其所视为夷狄的地方推行“汉化”，以期“夷狄”化为“中国”；或恪守“王者不治夷狄”的圣人之道，采取无为放任之政策。而在由异族统治者所建立的清帝国，其核心理念则是构建境内不同民族和区域皆认同帝国的多元化统治模式，在此一模式之下，帝国境内的各民族和区域只要在政治上臣服于清帝国，即可保持自己在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帝国亦对这种多元文化的存在采取优容甚至是鼓励的态度——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作为职责图上的绚丽多彩的点缀而已。

那么作为一个统治着一个广大帝国的异族君主，当使用何种方式，才能将其境内天南地北、形色各异的不同臣民都整合纳入到帝国的统治体系之中，或者说，是如何构建出一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帝国治理模式呢？“汉化”这种单线模式，在修辞和观念上，已然由于清帝国统治者的异族身份不得而用。^② 清帝国亟须找到一个符合其身份的替代

① 关于这一点，见第三章第二节。

② 尽管如前所言，清代的满人统治者反复重申要保持满人特性，提防汉化，但是清代君主在汉人面前扮演汉人统治者时，出于必要也会改易汉俗以便其治下的汉人臣民容易接受，如接受汉文、阅读汉代史籍经典、作为汉人艺术和文学的赞助和推广人，甚至满洲君主在某些方面放弃了自己的一些风俗习惯而依从汉人习俗。如满人的火葬仪式，一直因其毁损先人遗体而被素重孝道的汉人所诟病，清统治者们在顺治朝以后便放弃了火葬而改用土葬，以符合汉人之道义和习俗。乾隆朝严飭满人不得沾染汉人风习的谕旨，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面对四面包围的汉人文化的渗透，清代统治者所采取的也只能是守势。而十八世纪以降，清廷所采取的诸种挽救满人汉化的措施，亦未能阻遏满人抛弃自身传统而接受汉人文化的洪流。从陈捷先对清代最具满人传统的满语使用所进行的研究，亦可看出满人的特性在不断地被汉人文化所吞噬，并逐渐同于汉人。（详见Ch'en, Chieh-hsien. "The Declin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1644 - 1911", in Walther Heissig, ed., *Altaic Collect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6.）但即使如此，从观念上看，清代统治者从未视自己为汉人，亦不会使用汉化这样会抹煞自己民族主体性的字眼。当面对整个帝国进行全局治理时，清代君主会选择包容性强且可以淡化甚至消除种族畛域界限的文辞，一般地说，清代君主强调帝国的统一性，习惯使用“无分中外”，抑或是“天下”这样的政治地理概念，并且将自己称为不具有明显种族色彩的子民之父，而其治下的臣民无分种类，一律为君父之“赤子”。“赤子”这个词大量出现在清代的谕旨、实录和档案中，应当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品。于是一向为传统中国统治者，特别是汉人统治者倍加推崇的儒家思想便进入清代统治者的眼界当中。儒家思想积久以来被宣传为古圣先贤圣圣相传之道，其中包含尧、舜、汤、文、武等令后世追崇艳羡的历代圣君治国要法，不仅为知识菁英，更为一般俗众所认同；更重要的是，儒家一直以来便宣传自己的理念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儒家为世间万物安排了清宁祥和的秩序，如划分五服，从居于王畿抚育四方的天子，直至处于最边缘的要服、荒服。^① 儒家已然将世间一切尽数涵盖其中，故只要略加改造疏通，儒家就可以上升为帝国的意识形态，从而将民众对儒家思想的认同转化为对清帝国的认同。故解决问题的唯一也是最为合用的方案，即是将号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儒家思想，巧妙地运用于帝国的治理当中。清代异族君主利用儒家经典和古圣先贤教诲中模棱两可的词句，消解民众特别是笃信儒家的知识菁英基于华夷之辩而产生的抵触心理。同时，运用高超的手腕打造自己儒家理想圣王的形象。

对清代统治者而言，儒家思想中具有普世主义的一面，只要小心地将其中关于华夷之别的部分剥离开来，就很容易为异族入主中国建立政权提供合理而合法的权威根据。在儒家看来，统治者取得合法地位的关键与其身份无涉。儒家所推崇的古代圣王如尧、舜、文王，其出身皆微贱。更令清代异族君主欣喜的是，儒家经典中明白无误地指出，舜为东夷之人而文王为西夷之人，^② 由此观之，作为夷狄入主中国的满人君主更是名正言顺。君临天下的合法性来源只有一点，即是承受天命，而承受天命的唯一方式，就是德行足以匹配天地，以之养育

① “五服”的政治地理分区，被历代以来的儒家认为是由古代的圣王禹所制定的，记载儒家历代圣王法言要旨的《尚书》中《禹贡》一章对此描述得相当详细：“中邦锡土、姓，祗合德先，不距联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② 譬如雍正皇帝在一份斥责以华夷之别煽动叛乱的逆贼的上谕中言：“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见雍正《大义觉迷录》卷1，《上谕》。